

八股文汇编。

龚笃清 主编

BAGUWEN HUIBIAN

上

制艺之兴七百余年，
所以旧而不废者，盖以诸经之精蕴，汇涵于四子之书，
俾学童而习之，目以义理浸灌其心，
庶几学识可以渐开而心术归于正也。
——方苞

国家社科基金“八股文献整理及八股文史研究”项目（08BZW017）成果
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①
八股文汇编

龚笃清 主编

BAGUWEN HUIBIAN

八股文汇编

①上②下

主 编
龚笃清

副主编

肖玉华 张福清 周录祥
袁海林 罗朝蓉 赵松元

编纂例言

一、本书为明、清两代八股文的系统汇选本。采辑范围为明、清刊刻的各种八股文选本稿本，主要篇章来自清乾隆时的《钦定四书文》，个别篇章选自朱卷。入选作品遵奉一个“名”字，即八股名家、历代名臣之作，以及在八股文史上流传久远的名篇。为帮助读者理解所选之文及接触八股文评点学方面的知识，原文后的评语也予以保留。

二、所收文章的时限，上自明代洪武八股文初创之时，下迄清光绪八股文废止之前。宋代经义是八股文的直接源头，故酌收宋张庭坚等人的几篇以示程式。

三、本书按作者出生年之先后排列其文。出生年不可考者，则参照其登科年、卒年或交游线索来推定其排名之先后。若以上信息全无，则将他们归并置于某个大的时间段之后。

四、全书共收八股文 777 篇，其中宋经义 3 篇、明文 482 篇、清文 292 篇。作者计 220 位，其中宋人 3 位、明人 119 位、清人 98 位。所选文以四书文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五经文。

五、本书每位作者都系以评传一篇，以介绍并评析他们的生平及其八股文的特色，其文其人在八股文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将几百位作者的评传串读一遍，便可略窥八股文的发展轨迹，把握八股文对各人的思想、修为的影响，认识八股文的价值与功能。

六、题目后标有“程”字者为程文，标有“墨”字者为墨卷。二者均为乡试、会试时的优秀之作，选刻为标准范文的。只不过程文多为主考之作，墨卷为考生之笔。

八股文概述

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专门用以培养、选拔官员。

从本质上说，八股文属于经学的范畴。因为它的题目必须从《四书》、《五经》中摘取，其发挥不能违背程朱等人的传注所划定的思想范围，且要入口气代圣贤立言，这些规定便将八股文牢牢地捆绑在儒家经典上，使它成为以经文注疏为依托，凭个人的领悟、体会对《四书》、《五经》进行解说的一种特殊文体。通俗地说，八股文就是明、清两代读书人学习《四书》、《五经》的心得体会。

八股文最初无八股之设，而是沿用宋、元经义的体式，只要将题旨解说明白即可。到后来，为适应大规模考试阅卷的需要，以及培训士人的思维能力、诗赋写作技能才逐渐形成八股的体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八股文只是经义的一种。而入口气代圣贤立言及体分八股，又使八股文内蕴着文学的因素。

八股文是一种极具功利性的文体。统治者以之为工具来传输程朱理学，统一士人思想，培养、选拔合乎封建统治需要的人才。因此，统治者以种种功令保证程朱理学对八股文话语权的独霸，阻止任何其他思想的进入。而士人也以它为获取功名利禄的唯一手段。这样，就造成了八股文不可根治的内外矛盾：一是八股文的经学性与其体内逐渐增长的文学性的矛盾；一是统治者欲不断强化其经学性来控制士人思想与士人反抗这种控制而产生的外部矛盾。两种矛盾的冲突，形成了八股文与时俱变的特性即趋

时性。综观八股文的发展、演变史，就是一部经学化与文学化此消彼长，控制与反控制不断斗争对抗的历史。只要循此线索，就可把握八股文随时代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规律，理解它的内容与体式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形态、引发八股文坛无穷纷争原因之所在，由此也折射出八股文对社会和士人思想影响之巨大。所以，对八股文史的研究即是对明、清文化史，以及社会史、思想史的一种研究，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

明代洪武、建文两朝是八股文的初创期

洪武三年庚戌（1370），明太祖朱元璋颁布开科取士诏，是年八月，在京师及各行省举行了乡试。“初场试《四书》疑问，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次年正月，又“令各行省连试三年”（《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三月，在京师举行会试。由于所试的《四书》疑问及经义所采用的仍是元代的格式，以此作标准选拔出的官员不符合朱元璋欲借科举选择具有儒家正统思想治国人才的理念，故洪武六年癸丑（1373），深感失望的朱元璋下令暂停科举，并对选用什么样的考试文体进行了深入思考。这一停便是十年。在这十年中，朱元璋经过反复地思考和比较，在吸取了宋元经义的优长之后，创制了后来发展成八股文的明代制义，并于洪武十七年甲子（1384）科作为取士的工具而第一次使用。

这种制义的体式与定型后的八股文有较大区别，但有三项原则大致是相同的：

一、题目必须从《四书》、《五经》中摘取，明初多出正大之题。写作时要严格遵题，就题来谈学习心得。

二、发挥题旨必须依据传注。但朱元璋规定不专主程、朱一家，古注疏等皆可。而后来则规定以程颐、朱熹的传注为主。

三、要入口气代圣贤立言。即是说，一题到手，便要揣摩题

中人物心理，化自身为题中人物，代言对象，把自己对题目研究的心得体会，以题中人物的口吻，惟妙惟肖地表述出来。只不过这一时期的入口气还不成熟，处于初级阶段，不如后来的熟练生动。

在体式上，这时的经义与宋、元时相同，只有破题、承题、起讲（或原题）及古文化的正文，与定型时的八股文差别较大。这从仅存的黄子澄洪武乙丑科应试墨卷及刘基、方孝孺、解缙等寥寥几篇尚存的早期八股文都可得到印证。其最主要的不同在于此时八股格式尚未形成。正文部分或对或散，各随其便，并无硬性规定，格式较宽，束缚不严。作者只要讲明题目的本义，阐明它所包蕴的圣人之理，不违背朱熹及指定的其他古文的传注即可。

此时的士子，在明初的政治高压之下，无不熟读经书，体会语气，依经守注，以理法为尚，老老实实地去按题写自己的心得体会。不用华词丽藻，不讲机法，不要花样，不追新逐异，只求依照注解，将题中大道理发明便成文章。其高者力求讲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其次者近似抄录改写传疏，被后人称为“注疏体”，或说有“注疏气”。故此时之文都朴素无华，具有古风。说理贴切，不故作高深。其高者皆简要亲切，绳墨谨守，尺寸不逾，朴略而古雅。但大多数都失于平淡枯燥，被后人讥为“枯简”、“无文”。古语说言而无文，故行之不远，明代初创时期的八股文之所以极少留存下来，除开永乐时的“靖难之役”损毁严重，且时代又久远等原因外，“无文”，平淡枯燥，只直写传注的作法可能是其不能流传的更重要之因。这样的文章体式不拘，说理直露，不仅后世无摹拟揣摩的必要，读来也枯燥乏味，又有什么人会珍藏保存它呢？这样流传下来的自然就很少了。上述种种情况，是任何一种文体在初创时必然会出现的。

从永乐到天顺是八股文的发展期

永乐到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年间，是八股文的发展阶段，在这段时间里，八股文无论是体式、作法还是内容，都处于明显的变动不居的状况之中，一切都在探索变化。

体式在不断地向标准的八股格过渡。永乐年间于谦的八股文就采用了八股格式，到宣德、正统年间，王恕的八股文就是平实纯正，清微细净的标准八股格式了，但此时尚未定型。

在内容上，永乐时期，士子们仍在政治高压的笼罩之下，特别是朱棣又钦定颁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更强化了程朱理学的地位，初次强调遵经守注之重要。所以这一阶段士子们在写作时更注意恪守传注，尺寸不逾，不敢稍背。一题到手，必循题位置，自首及尾，不敢有一言倒置，其文经学性质特别鲜明，保证了载道功能的完整实现。但到正统、景泰、天顺时期，由于内忧外患，统治者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力有所削弱，各种奇涩险怪的言论和见解开始在八股文中出现。虽然整体上仍保持了浑厚之风，但其变化不容小视，是八股文冲决儒家正统思想独占的先声。

洪武、建文时期的八股文，只是老实地敷衍传注，阐述题旨，不讲究作法。到这一时期，也开始变化，如宣德、正统时的八股高手王恕就很重视文章的技巧，所以后人说“制艺以机法胜者，自王三原（王恕）始”（杨懋建《四书文源流考》）。其《乡人皆好之》一章题文，八股格式运用纯熟，作法讲究，流水开合，在八股体式内将题旨阐发无遗，开了隆庆、万历八股文大家讲求作法之先河。

在题型上，为对付猜题、剿袭之风，维护科举取士的公平、公正，这个时期开始创制“摘裂牵缀”的小题。这种强截句读，

破碎经文的各式小题，使学者学无依据，思无约束，使之背离了儒家正统思想，破坏了八股文的载道功能，且屡禁不止，最终对八股文本身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八股文名声之臭，文体之衰陋，很大程度上是这种题型造成的。这也是八股文在这一时期发展变化之一端。

从字数来看，洪武十七年定为成式时，规定四书义为二百字以上，五经义三百字以上，到永乐初字数增多，篇幅加大，这样有利于说理的详尽充分。

从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八股文总的风格是简朴浑穆。其内容“惟以明理为主”（《四库全书总目》），讲究合题旨，得题神，明书义，也即恪遵传注。其文明白切实，“取书旨明晰而已，不尚华采”（《明史·选举志》）。且体式不拘一格，使这一阶段的八股文坛异彩纷呈。

这一阶段的八股名家不多，只有于谦、杨慈、薛瑄、陈献章、商辂、岳正、王恕、邱濬、李东阳等寥寥数人。他们共同的特征是：文风简古。他们看题既真，用力不苟，学力富，识见确，思路精深，词锋英爽。他们讲究八股文要取神、取骨、取理、取气，把字、句放在最后。对文辞“取朴老不取繁艳，取简洁不取淫浮，取典雅不取卑靡，取名贵不取庸陋，取古劲不取柔媚。赖以吐圣贤之语气，而显其须眉也”（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二）。他们的文章叙题面处多，发所以然者少，而题意却赫然显露于题面之中，这种本领是以后之人所难以达到的。其上者能以朴实无华的文字，略加点缀，敷衍传注，即能表达出题目中的微言大义，或稍加疏通条达，便能使立言之旨晓然易见。这种本领更让后人折服。晚明的八股名家钱禧就认为八股文以天顺以前为极盛。

认真分析这些人的八股作品，再结合他们所处的时代加以研究，可以发现，这些人所取得的成绩，正是他们顺应时代的变

化，不墨守成规，对八股文不断作出改进的结果。在客观上，自永乐以后，明朝统治者的统治有所放宽，尚未以功令形式对八股文加以种种苛严的限制，给他们提供了改进八股文的可能，也给他们的写作留有较大的自由空间，文章也易写好。而这些名家例如邱濬、李东阳等，能从维护科举选人的公正、合理出发，自觉地担当维护和发展八股文的责任，对不良倾向及时予以制止，对有利于八股文健康发展的加以提倡，使这一时期的八股文成为既能有效地担负起向士子传输儒家正统观念的任务，又使写作者不受过苛束缚，有利于他们较多地表达个人心性的一种文体，从而获得了后人的高度评价，对社会的影响也比较正面。所以把这一时期称为八股文的发展阶段是实事求是的。

成化、弘治是八股文的成熟期

成化、弘治两朝是八股文的成熟期。这时体分八股的文体已经定型，标准体式已被士子们完全接受并能熟练使用，在各级科举考试中已成为规定的体式。八股文已成为能在严格程式化的框架内完满表达文题内蕴，即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契合无间的统一体。文体的成熟在八股文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它规范写作者必须在固定的格式中，一层层地将题旨阐述殆尽，从而加深他们对儒家正统思想的理解，加强了八股文的传道功能；另一方面，要在这种文体所设置的种种束缚下将题旨阐述一空，这就需要有因难见巧的能力，也成为考官检验考生智商高低及对经典熟悉程度的重要标准；再一方面，通过这种文体所设置的逻辑关系和对声律、对偶的要求，又可训练作者的思维能力和诗、赋等的写作素养。这种成熟的文体被确定为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专用品，对造成思想的一统，培养选拔具有较强儒家道德价值观和一定思维能力、文化素养的人才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明、清两代的

忠臣义士、名宦干吏几乎都是写八股文出身的即是明证。然而，这种文体对士子思想的束缚过严，对中国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长此以往，还会使思维模式化、凝固化，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不利的。只是成化、弘治还是刚刚开始大力推行，其弊端还没来得及显现，而其对社会、对文化的作用却比较正面，故此时的八股文受到后人大力推崇。不过，也有明眼人看出这一时期八股文所潜藏的危机，对它加以否定。如晚期的钱禧就说八股文以天顺以前为极盛，至成化、弘治而衰。应该说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成、弘八股文臻于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无体不备，众法皆工。

所谓无体不备，是指与八股文各种不同类型的文题相适应的体式在此时也臻成熟，后人在八股文体式的创制上已不可能再出新。

八股文的题目必出自《四书》、《五经》，这是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可更改的。最初所出之题，均是书中整句、整节、整章之文。但因试题库容量太少，多少年下来，所有可出意义完整之题的内容全已出完，故给猜题作弊提供了可乘之机。为了防止猜题抄袭，也为了加强思维训练的力度，考官们尝试改变文题的摘取与组合方式，在天顺时期，便产生了名目繁多的所谓小题。由于这类题目或截头或去尾，或截或搭，破碎了经文，也使原有的注释失效，因而作者可对文题作多元阐释。作这样的文题，便使八股文的载道传道功能大废。为了最大程度地减轻这种文题对儒家经典的破坏度，减少其弊端，同时又使这些怪异难作之题能作好，经过长期的写作实践的摸索、探讨、补充、完善，这些类型的题目也都形成了各自的文体格式，有自己的审题与写作规范与要求。至成化年间，这些体式与规范也臻成熟，故后人对成、弘的八股文有“无体不备”的称说。

所谓“众法皆工”，是指八股文已摆脱了明初直述题旨，敷衍大义，以经传语加注疏句拼凑成文的做法，总结出八股文的写作规律与一系列写作方法，并能熟练使用。

成、弘的八股文特别讲究写作方法与文章的气脉，制格、炼局法已具备，各体文章的起伏开合等基本写作方法至此已经齐全。后人称此时的名家名作为“无一字一句不是法度”（《明文钞》中《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一文尾评）。形成了为后人所遵从的“成弘法脉”，开了后世不断探求八股文作法之先河。

在内容方面，成化、弘治大体沿用了此前“恪遵传注，体会语气”的作法，其文纯以理胜。但此时对传注的阐发较之前人更为圆融、深入，较好地避免了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时期直写传注的浅露及对比改换字面而意义无别的毛病。

成、弘的八股名家们，都能将白文朱注了然于胸，经学熟而传注明。故在行文中必用传注处，也会将其融化于文词中而不直写，做到文中经语与题文契合如同己出。能实其虚以发其微，虚其实而不窒。在写作中能顺题成文，略加虚字点逗，于断续离合间而神气流荡合节，文章便有了精理秀气，意度谨严。

清代著名学者、八股文名家何焯在《两浙训士条约》中说：“成、弘以前举业，以能熟记传注为尚，仅具对偶，固与帖括无异也。久而琼山（邱濬）、长沙（李东阳）在馆阁，颇病其不能解义，思创革文体……以情纬物，以文被质。彬彬乎，郁郁乎，自为一代之文，而非复元经义之旧矣。”（何焯《义门先生集》卷十）无体不备，众法皆工，使得八股文告别了注疏体，有了文学性，这便标志八股文已走向全面成熟。

成化、弘治时还产生了大批八股文名家高手，特别是产生了王鏊与钱福这样在八股文史上具有宗师意义的大师级人物。

王鏊在八股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被视为八股文的开山宗师。他集明代前期八股文之大成，各体兼备。他又揭示了八股文

的文学性，开始追求文体的内在和谐与圆美，讲究文章的理、气、神及技法，开启了后人无数法门。清代八股文名家俞长城对他极为推崇，把他比为史家中的司马迁、诗家中的杜甫、书家中的王羲之，说：“前此风会未开，守溪（王鏊字）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包；理至守溪而实，气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备，盖千子（艾南英）、大力（章世纯）、维斗（杨廷枢）、吉士（钱禧）莫不奉为尸祝。”（《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题王守溪稿》）钱福与王鏊并称，其文发明义理，敷扬正道，正大淳确，典则深严，考据颇详，摹画刻肖，颇见才情。究其实，则不能与王鏊匹敌。其他如吴宽文的春容大雅，不动声色；邵宝文之游扬静致；董玘文之神骨绝似韩愈，游行理窟；顾清文之高洁；顾鼎臣文之豪迈；王守仁之谨遵朱注，句醇字核，法律细密，原本韩愈、欧阳修，而有豪杰气象；唐寅恃才任达，而其文皆根于学问……这么一大批名家高手，将成化、弘治时的八股文坛装点出群星璀璨的繁荣景象，为后世所称赏。其文其法，是后世遵循揣摩的样板，评文者常用“未离化治矩矱”作衡文标准。凡此种种，无不证明成化、弘治是八股文的成熟期。

正德、嘉靖是八股文的极盛期

明代的正德、嘉靖两朝是八股文史上公认的极盛时期。

这是因为该时期在八股文史上形成一道分界线：在此之前，八股文浑穆初开，无论文体、理念、作法，都处于一种从初创到逐渐成熟的动态变化过程之中。虽然在成化、弘治时已臻全面成熟，但尚有足资完善之处，并出现了新的问题。此后则不复盛时光景，文风、文体、内容都在随时代变化而逐渐演变。八股体式已被突破，程朱传注不必恪遵；精研机法，追新逐异之风大炽。

其上者逞使才情，使八股文呈现很强的文学色彩，但削弱了其经学性。其下者，偏离了八股文创立的宗旨，违背了程朱理学，使八股文逐渐弱化其传道功能，大受当时及后世诟病。只有正德至嘉靖末年之前的八股文，既恪守了朱元璋“国家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的规定，手握衡文选士大权的考官们则睁大眼睛，对“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阙名《松下杂钞》卷下），从根本上保证了八股文的导向，使之既能保持前期的风格与传统：体式正大，理实气充，义理精实，简古而又讲理法；作法圆熟，排比声调，裁对整齐，却又不使力，不使机，贴切通晓，坚重遒密，被后世称为“嘉靖盛时风格”；但又不拘守旧套，能根据时代的变化，注入新的理念，创造了新的作法，开拓出八股文写作的新境界，其影响直至清代末期。这就是改变了八股文面貌的“以古文为时文”。

正德、嘉靖时，商品经济走向繁荣，士风民俗为之一变，对旧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形成很大冲击。一些文人希图摆脱程朱理学的束缚，抨击它为“伪学”，把“言学则指程朱为道统”视为可笑。而以王阳明为代表一批人，则强调个人的内心体验，试图从儒学内部进行一次深刻的调整，给理学注入新的内容，以图重建道德规范，挽救理学面临的危机。王氏“良知”学说一出，士子趋之若鹜，从另一角度对程朱理学形成了威胁。

这两种行为方式，都冲破了明代前期恪守程朱理学教条的局面，形成了有一定学术自由度的文化氛围，使许多苦于八股文体制和内容桎梏的士人不愿“日惟章句是循，程式之文是习”（文征明《上守溪先生书》），对明代八股文形成强大的冲击。

同时，文学界出现的复古思潮，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八股文，因八股文是古文的一支。古文变，八股文也会随着改变，这是必然趋势。

为挽救八股文因文体僵化，写法刻板，内容单一，只许儒家

正统思想进入所形成的危机，一些有才华，有责任感，且又兼擅古文与八股文写作的文士如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顺应复古主义思潮，着手对八股文进行有限的改造，开始以古文为时文。即在不改变八股文的体式及代圣贤立言的根本原则之下，引入古文写作的技法，将古文的神理、气势及法度用于八股文写作，形成一种文从字顺，起伏抑扬，法度严密，有章可寻的新文风。且拓宽准入的内容，融经液史，对八股文的内容及话语权为程朱理学所独占的状况作些许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程朱理学对写作者的束缚，改变了过去拒绝其他思想与语言进入的封闭状况所形成的思想陈旧僵化，语言重复呆滞，开始吸纳其他经史中的思想与语言。《明史》中曾引述过礼部的疏文说：“国初举业有用六经语者，其后引《左传》、《国语》矣，又引《史记》、《汉书》矣。”疏文所述，即是以古文为时文后八股文坛的状况。

清代八股文大家方苞曾说：“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方苞《钦定八股文·凡例》）即是说，以古文为时文，不仅增强了八股文的表现力，使八股文的根本宗旨得到更好的实现，即所谓的“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更为重要的是，它增强了八股文的吸引力，化解了士子们的抗拒心理，也化解了八股文在时代变化面前所面临的巨大危机。读书人的写作兴趣有了一定提高，八股文的面貌也有了较大改变。自以古文为时文的作法形成风气，八股文的佳作名篇即大量涌现，各种选本中大量录入，这便是正德、嘉靖为八股文的极盛时期的表现。

正德、嘉靖八股文号为极盛的最主要标志是此时高手如云，名家辈出，且各有绝活在手，但皆恪守成、弘之规，扩而张之。其中最著名的有唐顺之、归有光，他们都博学多识，读书通理，是以古文为时文的开创者、宗师。唐则指事类情，曲折尽意，使人望而心开。归则精理内蕴，浩气流转，使人入其中而茫然。因

为唐顺之深透史事，归有光则兼达于经义。以古文为时文自唐开始，归又恢之以弘肆，实能以欧阳修、苏东坡之气，达程朱之理而吻合于当年之语气。归有光之八股文有两类高不可攀，一则醇古疏宕，运《史记》之义法而与题相合；一则朴实发挥，明白纯粹如道家常，人人通晓。两人都影响深远，为后世奉为时文正宗。

归、唐之外，还有茅坤讲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之法，深得古文疏逸处。其八股文惟取清空流利，古雅温醇，首尾一气旋转，为的是顺应时代使之明白易懂。许孚远坚重道密，显嘉靖盛时风格。瞿景淳贴切通晓，能别树一帜。其他如汪应轸、薛应旂、季本、罗洪先、诸燮、王锡爵、胡友信等，无不鼎鼎大名，并自成一家。群星灿烂，名作迭出，使正德、嘉靖的八股文号称极盛。

嘉靖末年、隆庆、万历是八股文的变革期

嘉靖末年、隆庆、万历是明代历史上的一大变局。此时的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产生出的大量金钱和财富侵蚀着传统的士风民俗，改变了人们的旧有观念，加速了政治的腐败。求新逐异成为一种时尚，非孔斥圣成为一种时髦。要求个性的解放也形成一种时代的潮流。一切在变，在这样的时代大变局面前，因有与时俱变的品性而获时文之称的八股文也在变，这是历史的必然。加上以古文为时文思潮的深入发展，士人们专讲机法，务为灵变，引发了一个对八股文全面变革的浪潮。它革除了一些束人心性过苛的东西，奇思异想，奇谈怪论常现文中，使八股文成为一些人炫怪矜奇、标新立异之具。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却因它们不遵从程朱理学，反而将一些离经叛道的思想和华词丽藻引入八股文，阉割了它的经学性，使之出现了文学化的趋向，与古文合二为一，严重地破坏了它的载道功能而受到不少正统人士的指斥，

称之为“芜靡极矣”。但名家之文，多格律整严，针线绵密，又皆因题立制，并非率意穿插。

具体而言，嘉靖末年、隆庆、万历时八股文的变化表现在几个方面。

在内容上，因“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个矣”（《明史·儒林传序》），大多数士子改变了恪守传注的做法，笔下常常透出与程朱理学不谐和之音，甚至与之驳难。有的人还在八股文中宣扬异端思想，非孔斥圣。这种与程朱传注渐行渐远的现象虽有利于个人思想的发挥，性情的表现，使得隆、万文多自由活泼之风，却削弱了八股文的经学性，从根本上违背了创立八股文用以培养选拔具有儒家正统思想之士的宗旨。

造成八股文内容变质的另一个原因是此时扬弃了过去的简古之风，而追求语言的华美艳丽，用以发抒自己的心性，加速了八股文的文学化，也即古文化。故这一时期多流丽优美、悦人耳目之名作，却削弱了八股文的经学性。如徐时进的《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四句题文，文字华若云锦，历代文评家均“叹为绮丽”。汤显祖以大文学家的笔调写八股，其文词之华美更非常人之所及，被历代文评家称为“笔援天花”，“穷工极妍”。他还被尊为明代八大制义名家之一。

万历中期以后，统治者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力日渐削弱，各种社会思潮纷纷出笼，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不仅诸子百家言论受到欢迎，佛道两教也趁势而起，尤其是此时已转入禅语之象的王阳明末学大为风行。它们的思想与语言都开始进入八股文，打破了八股文为程朱理学一家独霸的局面，也弱化了八股文的载道功能。

隆庆、万历的八股文还改变了成化、弘治已经定型的八股格式，制义时文不一定要有八股，四股、六股，甚至根本不分股，只以两大段从正反或虚实的角度来阐发题旨均可。且这种作法蔚